

谁归还了马尔都克神像？

——《年代记 P》相关记载考

陈 飞

内容提要 本文从《年代记 P》相关记载出发, 密切结合有关史料, 旨在考证《年代记 P》关于“马尔都克神像在亚述王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时期回到巴比伦”的记载真实与否, 并得出结论: 马尔都克神像不可能在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时期回到巴比伦; 该神像回到巴比伦时, 亚述王可能是尼努尔塔-阿普利-埃库尔, 而《年代记 P》概将后者的名字, 误写成为了前者的名字。

关键词 马尔都克神像 《年代记 P》 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 尼努尔塔-阿普利-埃库尔

马尔都克神像事件缘起

马尔都克(Marduk) 原为巴比伦尼亚的一个地方性小神,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成为巴比伦城的保护神; 自此至新巴比伦王国时期, 由于巴比伦城一直都是巴比伦尼亚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 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充当着巴比伦尼亚国家神的角色。马尔都克政治与宗教地位的上升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通常认为, 伊新(Isin) 第二王朝时期(公元前2千纪末) 以后, 它逐渐成为整个巴比伦尼亚的最高神^①。在古代两河流域, 若一国征服另一国, 征服者通常会劫走其保护神的神像, 以此作为彻底征服该国的标志。因此, 从古巴比伦王朝末期(公元前16世纪初) 起, 在巴比伦尼亚数次被异族征服期间, 马尔都克神像均为征服者掳走。然而, 神像每次被移往他国后, 均又重返巴比伦, 这意味着巴比伦的主神重回故地, 并为其地带来庇佑的作用, 而促成此事的国王, 也被视为

巴比伦尼亚的合法统治者, 或宗主, 并被大加颂赞。例如, 赫梯王穆尔西里一世(Mursilis I, 约公元前1620-前1590年) 在攻灭古巴比伦王朝时, 将神像移往赫梯, 后加喜特(Kassite) 王阿古姆二世(Agum II) 又将神像迎回巴比伦^②; 埃兰王库都尔-那昏特(Kudur-nahhunte, 约公元前1155-前1150年) 在灭亡加喜特王朝时, 神像被移往埃兰, 伊新第二王朝尼布甲尼撒一世(Nebuchadrezzar I, 约公元前1126-前1105年) 后大败埃兰, 并再度将神像迎回巴比伦^③; 亚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 公元前704-前681年) 在攻占巴比伦城时将神像移往亚述, 阿淑尔巴尼拔(Ashurbanipal, 公元前668-前627年) 即位后, 责令其兄(巴比伦王) 护送神像返回巴比伦^④。

除此之外, 《年代记 P》(Chronicle P) 记录了另一次马尔都克神像被掳走以及后来重回巴比伦的情形: 在巴比伦尼亚战争期间, 该神像被亚述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Tukulti-Ninurta I, 约

公元前 1242 - 前 1206 年) 掳到亚述一段时间后, 在亚述王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 (Ninurta - Tukulti - Ashur, 约公元前 1133 年) 时期又回到巴比伦。《年代记 P》是一部关于巴比伦尼亚的编年史, 因其最早的发表者平奇斯 (T. G. Pinches) 而得名, 取其姓氏首字母, 故称之。这部编年史分正反两面刻写在一块泥版上, 泥版已残缺, 现存部分约为原始泥版的三分之一; 残存内容是关于加喜特王朝的历史记载, 文献以加喜特王在位顺序依次展开记叙, 对每位国王统治时期的记载各成一段。文献系以标准巴比伦语写成, 其具体年代已不可考, 其作者应是巴比伦尼亚人^⑤。古巴比伦王朝时期及以前, 亚述与巴比伦尼亚之间的冲突几乎未见于文献, 双方关系也不甚明朗。然而, 从公元前 15 世纪上半期起, 亚述与巴比伦尼亚 (尤其是加喜特王朝) 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军事斗争开始较为系统地见之于文献记载, 除了《年代记 P》外, 相关记载还可见于《同步历史》(Synchronistic History)^⑥。根据这些文献资料, 在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一世之前, 亚述王对巴比伦尼亚采取的战略似乎是努力维持一条南部边界线, 因为此时的亚述尚无力击垮巴比伦尼亚。但是, 这一形势在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一世时期却发生根本逆转, 亚述不仅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巴比伦尼亚, 还在历史上首次吞并巴比伦尼亚。因而《年代记 P》所记载的这次巴比伦尼亚战争, 实为公元前 2 千纪期间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相互斗争的高峰。在某种意义上, 公元前 1 千纪期间亚述对巴比伦尼亚的反复征服, 似乎是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一世的巴比伦尼亚战争不同程度的重演。然而, 由于《年代记 P》这一记载, 即马尔都克神像在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时期回到巴比伦, 尚为孤证, 且与其他较为确定的相关文献所提供的线索存有冲突, 故此处记载的真实性有待考察。

通过《年代记 P》这一记载的考证, 我们将解答这个重要的史实问题: 马尔都克神像是否在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时期回到巴比伦, 或换言之, 将马尔都克神像归还巴比伦的亚述王是否为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 这一解答将不仅有助于澄清历史真相, 为相关亚述史研究确定可信的数轴坐标, 而且可进一步提高史料运用的有效性。

文献证据引发的逻辑冲突

《年代记 P》记载道: “……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一世回到巴比伦并将……带到……附近。他摧毁巴比伦的城墙并将巴比伦尼亚人付诸刀剑。他取走埃桑吉拉 (Esagila)^⑦ 和巴比伦的财宝作为战利品。他从王座上移走伟大的主马尔都克并将其带到亚述。他在卡都尼阿什 (Karduniash)^⑧ 安置官吏。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一世控制卡都尼阿什七年。在卡都尼阿什的阿卡德贵族发动起义并将阿达德 - 舒姆 - 乌苏尔 (Adad - shuma - usur) 置于其父的王位上后, 对巴比伦犯下罪恶的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一世之子阿淑尔 - 纳塞尔 - 阿普利 (Ashur - nasir - apli) 和亚述朝臣们反对他, 他们将他逐下王座, 将他囚禁在卡 - 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的一所房子里并将他杀死。直到(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⑨ 时期, 贝尔 (Bel)^⑩ 留在亚述 [N]^⑪ + 6 年。在(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的时候, 贝尔回到巴比伦。”^⑫ 此处的记载, 仅提到马尔都克神像在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时期回到巴比伦, 却并未言明或暗示当时巴比伦处在哪个王朝统治之下, 因而无法确定神像留在亚述的具体时间。然而, 这一隐去的信息点似可通过其他线索得以窥测。

一方面, 通过上述引文可知, 阿达德 - 舒姆 - 乌苏尔即位时, 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一世仍在位; 因此, 阿达德 - 舒姆 - 乌苏尔即位必早于图库尔特 - 尼努尔塔一世的下任王阿淑尔 - 那丁 - 阿普利 (Ashur - nadin - apli; 约公元前 1205 - 前 1203 年)^⑬。根据亚述王表, 从阿淑尔 - 那丁 - 阿普利到阿淑尔 - 丹一世 (Ashur - dan I, 约公元前 1178 - 前 1133 年), 共计 $3 + 6 + 5 + 13 + 36/46 = 63/73$ 年^⑭; 而根据《巴比伦王表 A》(Babylonian King List A), 从阿达德 - 舒姆 - 乌苏尔到恩利尔 - 那丁 - 阿黑 (Enlil - nadin - ahi, 约公元前 1158 年), 共计 $30 + 15 + 13 + 1 + 3 = 62$ 年^⑮。因此, 在阿淑尔 - 丹一世在位期间, 加喜特王朝已经覆亡, 因而作为其下任王, 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的在位时间当更在加喜特王朝灭亡之后。

另一方面, 一封某位巴比伦王致某位亚述王的信件^⑯ 曾提到尼努尔塔 - 图库尔特 - 阿淑尔, 并涉及二者之间一次未达成的会晤。在这封信

中,巴比伦王的语气倨傲而强硬,他不仅训斥亚述王,甚至对亚述王提出战争威胁^{①7}。由于阿淑尔-丹一世曾击败加喜特王扎巴巴-舒姆-伊地那^{①8}(Zababa-shuma-iddina,约公元前1158年),而扎巴巴-舒姆-伊地那与加喜特末王恩利尔-那丁-阿黑又一直在为抵御埃兰人而疲于奔命^{①9},因此,他们应无力对亚述表现出如此强硬的外交姿态。据此推断,这位巴比伦王不可能是加喜特王朝国王,而应该是伊新第二王朝国王^{②0}。此外此信还提到,这位巴比伦王的父亲曾对逃到巴比伦尼亚的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提供帮助^{②1}。鉴于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在位时间可能不足一年^{②2},因此他当政时,伊新第二王朝必已建立。

通过上述可知,若马尔都克神像在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时期回到巴比伦,则当时的巴比伦应处于伊新第二王朝统治下。然而如前所述,埃兰人在攻灭加喜特王朝时,也将马尔都克神像从巴比伦掳走,于是就形成一个时间先后顺序的冲突:亚述人不可能在埃兰人移走神像之后将神像归还巴比伦,而埃兰人也不可能将神像移走之前将该神像移走。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逻辑冲突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亚述人与埃兰人移走的是同一座神像,导致这一冲突的根源,则是亚述人归还神像和埃兰人移走神像应遵循最基本的时间先后顺序。由于埃兰人移走神像一事可由多方材料佐证,故其真实性应当不疑,因而为化解以上冲突,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要么证明上述前提不成立,即亚述人与埃兰人移走的并非同一座神像,如此一来,则可规避双方行动的时间先后顺序,故以上的冲突便无从产生;要么证明上述前提成立,即亚述人与埃兰人移走的是同一座神像,但《年代记P》记载有误,即马尔都克神像并非在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时期,而是在此之前回到巴比伦,如此则埃兰人才有可能在亚述人归还神像之后将其移走。以下就此两条途径分别进行论证。

亚述人与埃兰人是否移走同一座神像?

若亚述人与埃兰人分别移走不同的马尔都克神像,则不外乎有两种可能:其一,巴比伦先后不止一座马尔都克神像。亚述人移走神像后,当

地造出一座新的神像以填补空缺,后来埃兰人拿走的正是这一替代品^{②3};其二,当时在巴比伦同时存在多座马尔都克神像,亚述人移走其中一座,埃兰人随后移走另一座。

然而,这两种可能性均难以成立。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巴比伦当局不可能在马尔都克神像被移走后赶制出一座新神像以代替旧神像:首先,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神像不是简单的符号、象征或偶像,神像即为神本人^{②4}。神像从某地被移走,通常可以理解为神本人离开那个地方。例如,在记叙马尔都克神像三次被劫的《马尔都克预言》(Marduk Prophecy)中,马尔都克以第一人称在诉说“我去往赫梯……我保佑亚述。我返回……我去往埃兰……”^{②5}。因而,神像缺席的实质是神本人缺席。在神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单纯补造一座神像,并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其次,当神像不在神庙时,神的象征物会暂时履行神像的部分职能,但某些特定的仪式却因神像的缺席而无法进行^{②6}。例如,在巴比伦的新年庆典(Akitu)中,马尔都克神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在辛那赫里布将马尔都克神像掳至亚述后,巴比伦的新年庆典中止达20年之久,直至马尔都克神像重回巴比伦后才得以重新举行^{②7};再如,在辛那赫里布时期,埃兰人将伊施塔(Ishtar)神像劫往埃兰后,伊施塔神庙的日常供奉也随之中断^{②8}。因此,若被移走的神像可由新神像替补,则这些仪式将没有理由暂停。又如,如前所述,在巴比伦尼亚历史上,巴比伦王将被劫的马尔都克神像迎回巴比伦,往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加喜特王朝阿古姆二世将被劫的马尔都克神像迎回巴比伦,这成为他取得统治巴比伦尼亚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保证^{②9}。伊新第二王朝尼布甲尼撒一世在大败埃兰后,将马尔都克神像从埃兰迎回巴比伦,也成为许多诗歌作品的题材^{③0},而尼布甲尼撒一世也被奉为“巴比伦尼亚的复仇者”^{③1}。由此看来,若马尔都克神像可被简单替代,则这些政治宣传将毫无实际意义^{③2}。

此外,对第二种可能性的假设也不足以成立。有学者根据一份被称作“马尔都克崇拜纲领”(A Cultic Compendium of Marduk)^{③3}的文献得出,巴比伦同时有七座马尔都克神像,亚述人和埃兰人可能先后移走两座不同的神像^{③4}。这份所谓的“马

谁归还了马尔都克神像?

尔都克崇拜网略”是公元前1千纪的一个抄本,其原始版本年代已不可考^⑤,而亚述人和埃兰人移走马尔都克神像却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因此,即便文献解读准确无误^⑥,但由于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以后,尤其是伊新第二王朝时期极有可能是马尔都克日渐上升为美索不达米亚至高神的关键时期^⑦。期间,或许会发生某些宗教观念和仪式的改变,因而在文献原始版本年代不确知的情况下,很难确证文献所描述的正是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的实际情形。这是其一。根据这份文献,七座马尔都克神像由不同的材料制成,位于不同的神庙^⑧,且可能有着不同的职能(分别用于不同的宗教仪式),并被塑造成不同的姿势^⑨;但是,其中只有一座木制的主神像位于马尔都克神庙埃桑吉拉的马尔都克崇拜室埃乌姆沙(E-umuša)^⑩。若亚述人和埃兰人分别拿走不同的神像,则他们之中必有一方移走除主神像之外的另一座神像,这种情况略显离奇,也很难进行解释。这是其二。或许有必要去分析记载亚述人和埃兰人移走马尔都克神像的文献。《年代记P》记载亚述人移走神像的语句是“^dBēl rabū^d Marduk [ina šu] b-ti-šú id-ke-e-ma”^⑪,即意为“他从其王座上移走伟大的主马尔都克神”;关于埃兰人移走神像的文献则记载道:“^dAMAR. UTU E]N(?) ra-[ba]-a id-de-ki ina šu-bat[……]”^⑫,即意为“他从其……王座上移走伟大的主马尔都克神”。这是其三。

通过对比,可知这两处文献的表述如出一辙:一是动词完全一样,都是dekūm,意为“使……起身、离开”;二是状语几乎一致,前者是ina šubti,意为“从王座上”,后者是“ina šubat[……]”,意为“从其……王座上”。类似的例子还有“rubā Marduk ušaggagma ina id-de-ki ina šub-ti-šú adekkēma”^⑬,意为“我将激起王马尔都克的愤怒,我将使其从王座上离开”。由于神像与神是同一的,而神的“王座”也应具有唯一性。因此,这两处文献所记载的被移走的马尔都克神像应无不同。此外,由于掳走神像通常是征服者宣示胜利的手段,所以即便当时有多座马尔都克神像,为达此目的,亚述人或埃兰人完全可以将全部神像一并掳走,为何只移走其中一座而留下其余几座?总之,这两种可能性,即当时的巴比伦先后或同时

存在多座马尔都克神像,均无法自圆其说。就是说,亚述人与埃兰人不可能分别移走不同的马尔都克神像,相反,他们移走的应是同一座神像。

归还马尔都克神像的亚述王是谁?

由于亚述人与埃兰人移走同一座马尔都克神像,故上述文献证据引发的逻辑冲突将不可避免,而这也意味着《年代记P》对此记载失真,即将马尔都克神像归还至巴比伦的亚述王不可能是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而应是在他之前的另一位亚述王,《年代记P》对这位王的名字记载有误。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来看,这位亚述王可能是尼努尔塔-阿普利-埃库尔(Ninurta-apli-Ekur;约公元前1191-前1179年)。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尼努尔塔-阿普利-埃库尔与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的名字较相似,且前者是亚述王表中第82任王,后者是第84任王,中间只隔着阿淑尔-丹一世,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引起混淆。第二,在加喜特王阿达德-舒姆-乌苏尔击败并俘获亚述王恩利尔-库杜瑞-乌苏尔(Enlil-kudrri-usur,约公元前1196-前1192年)之后^⑭,尼努尔塔-阿普利-埃库尔从巴比伦尼亚返回亚述,并可能在阿达德-舒姆-乌苏尔的支持下登上王位^⑮。在此背景下,尼努尔塔-阿普利-埃库尔将马尔都克神像归还巴比伦,不排除是一种“投桃报李”的政治交易。第三,同时,在击败恩利尔-库杜瑞-乌苏尔之后,阿达德-舒姆-乌苏尔进占巴比伦^⑯,而这应当是他索回马尔都克神像的绝佳时机,因为他可以借此树立政治威信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第四,阿达德-舒姆-乌苏尔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王,甚至是加喜特王朝后期最强大的国王^⑰,而相比之下,在当时的亚述,王位变换频仍且王铭数量骤减^⑱,亚述国力可能已现衰微之势。在阿达德-舒姆-乌苏尔致亚述王阿淑尔-尼哈里三世(Ashur-nirari III,约公元前1202-前1197年)的一封信中,他称阿淑尔-尼哈里三世为“小国王”,又侮辱性地调侃他“不是疯了,就是喝醉了”^⑲。阿达德-舒姆-乌苏尔能在信中对亚述国王表现出如此之强势,这或许说明当时的巴比伦尼亚较之亚述应握有更大的主动权。因而,在尼努尔塔-阿普利-

埃库尔时期,阿达德-舒姆-乌苏尔也应有实力向其索回马尔都克神像^⑩。

综上所述,《年代记P》所记“马尔都克神像在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时期回到巴比伦”不实,归还马尔都克神像的亚述王不应是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而应是尼努尔塔-阿普利-埃库尔,《年代记P》的作者可能误将后者写成了前者。^⑪ ㉑

①⑤⑥⑫⑬ A. K. 格雷森《亚述与巴比伦尼亚年代记》, (A. K. Grayson,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Chronicles*), 纽约: 1975年,第279、56-59、170-177、175-176、162页。

②⑤ M. W. 查瓦拉斯《古代近东: 历史材料译本》(M. W. Chavalas, *The Ancient Near East Historical Sources in Translation*), 布莱克维尔: 2006年,第135-141、171-172页。

③ G. 弗雷姆《巴比伦尼亚的统治者: 从伊新第二王朝到亚述统治的结束, 公元前1157-前612年》(G. Frame, *The Rulers of Babylonia, From the Second Isin Dynasty to the End of Assyrian Domination*), 即《美索不达米亚王铭: 巴比伦尼亚时期》(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Babylonian Periods) 第2卷, 伦敦、布法罗、多伦多: 1995年,第19-33页。

④ D. D. 卢肯比尔《亚述与巴比伦尼亚古代记录》(D. D. Luckenbill, *Ancient Records of Assyrian and Babylonia*) 第2卷, 纽约: 1927年,第152、244页。

⑦ 埃桑吉拉(É-sag-gil)即巴比伦的马尔都克神庙。

⑧ 卡都尼阿什(^{kur}Kar-an-dun-ia-àš)原专指加喜特时期的巴比伦尼亚,后成为巴比伦尼亚的代称。

⑨ 原文中“尼努尔塔”被省去,但由于并无亚述国王名为“图库尔提-阿淑尔”,故 W. 瓦尔内(W. Weidner)认为此处应系指“尼努尔塔-图库尔提-阿淑尔”。A. 波贝尔《豪尔萨巴德亚述王表(续)》(A. Poebel, “The Assyrian King List from Khorsabad (Continued)”), 《近东研究杂志》(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第1卷, 1942年,第486页。

⑩ 贝尔,意为“主人”,特指马尔都克神。

⑪ “N”为一个十位数字,泥版中此处符号已无法辨识。

⑬ 在三份较完整的亚述王表中,《纳索伊王表》(Nassouhi King List)和《豪尔萨巴德王表》(Khorsabad King List)所记这位国王是阿淑尔-那丁-阿普利,而《SDAS王表》(Seventh Day Adventist Seminary King List)所记为阿淑尔-纳塞尔-阿普利,波贝尔认为前者较准确, A. 波贝尔《豪尔萨巴德亚述王表》(A. Poebel, “The Assyrian King List from Khorsabad”), 《近东研究杂志》,第1卷, 1942年,第487-491页。H. 哈根斯则认为,两者可能分别在阿淑尔和卡-图库尔提-尼努尔塔继承王位,故不同的王表记载各异, H. 哈根斯《亚述王表与年代记评论》(G. Hagens, “The Assyrian King List and

Chronology: a Critique”), 《东方学杂志》(Orientalia), 第74卷, 2005年,第37页。

⑭ 《纳索伊王表》所记阿淑尔-那丁-阿普利在位4年,《豪尔萨巴德王表》所记为3年,《SDAS王表》所记阿淑尔-纳塞尔-阿普利在位3年,但此微小差异并不影响计算。较大的差异在于尼努尔塔-阿普利-埃库尔和阿淑尔-丹一世的在位时间,《纳索伊王表》所记为13年和26+X年,《豪尔萨巴德王表》和《SDAS王表》所记均为3年和46年。学界普遍认为,两位国王分别在位13年和46年, H. 塔德莫《正确释读阿卡德语 dāku 的历史含义》(H. Tadmor, “Historical Implication of the Correct Reading of Akkadian dāku”), 《近东研究杂志》,第17卷, 1958年,第135页; M. B. 罗顿《西亚材料和埃及第19王朝的年代学》(M. B. Rowton, “The Material from Western Asia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Nineteenth Dynasty”), 《近东研究杂志》,第25卷, 1966年,第242-243页。也有学者认为这段时间共计13+36=49年, N. 纳阿曼《根据巴比伦和亚述国王及美索不达米亚年代记而得出的时间跨度》(N. Na’aman, “Statements of Time - Spans by Babylonian and Assyrian Kings and Mesopotamian Chronology”), 《伊拉克》(Iraq), 第46卷, 1984年,第117页。H. 哈根斯《亚述王表与年代记评论》,第39-40页。

⑮⑯ A. K. 格雷森《王表与年代记(阿卡德语部分)》(A. K. Grayson, “Königlisten und Chroniken. B. Akkadisch”), 载 D. O. 艾扎德主编《亚述学名物辞典(第6卷)》(D. O. Edzard,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äologie*, Sechster Band VI), 柏林、纽约: 1980-1983年,第92、176页。

⑰⑱ A. K. 格雷森《亚述王铭》(A. K. Grayson, *Assyrian Royal Inscription*), 威斯巴登: 1972年,第1卷,第143-144、134-138页。

⑲ J. A. 布林克曼《后迦喜特时代的巴比伦尼亚政治史》(J. A. Brinkma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ost-Kassite Babylonia*), 罗马: 1968年,第43、102页。

⑲⑳ H. 塔德莫《正确释读阿卡德语 dāku 的历史含义》,第138、132页。

⑳ J. A. 布林克曼《后迦喜特时代的巴比伦尼亚政治史》,第43页,第101-104页; D. J. 怀特曼《亚述和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1200-前1000年》(D. J. Wiseman, “Assyria and Babylonia, c. 1200-1000”), 载《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2卷, 剑桥: 1975年,第2部分,第449页。

㉑ I. J. 格尔布《两份亚述王表》(I. J. Gelb, “Two Assyrian King Lists”), 《近东研究杂志》,第13卷, 1954年,第228页。

㉒ A. 波贝尔《豪尔萨巴德亚述王表(续)》(A. Poebel, “The Assyrian King List from Khorsabad (Continued)”), 《近东研究杂志》,第2卷, 1943年,第61页。M. 罗顿《亚述王表中的Tuppū》(M. Rowton, “Tuppū in the Assyrian King - Lists”), 《近东研究杂志》,第18卷, 1959年,第219页。

谁归还了马尔都克神像?

- ②③J. A. 布林克曼《后迦喜特时代的巴比伦尼亚政治史》,第103页。W. 迈耶《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巴比伦战争》(W. Mayer, "Der Babylonische Feldzug Tukulti - Ninurtas I. von Assyrien"),《古代近东语言和铭文研究》(Studi Epigrafici e Linguistici sul Vicino Oriente Antico),第5卷,1988年,第155页。
- ②④L. 奥尔林《古代近东的生活和思想》(L. Orlin, Life and Thought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另见D. 卡茨《重建巴比伦:将神话传统发展为一种新神学》(D. Katz, "Reconstructing Babylon: Recycling Mythological Traditions Toward a New Theology"),载E. 坎西克-基尔什鲍姆等主编《东西方的巴比伦文化知识》(Eva Cancik - Kirschbaum, Babylon Wissenskultur in Orient und Okzident),德格吕特:2011年,第123页。
- ②⑤F. 魏格曼《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学、祭司和崇拜》(F. Wiggermann, "Theologies, Priests and Worship in Ancient Mesopotamia"),载J. 萨松主编《古代近东文明(第3卷)》(J. Sasson, Civilizations of Ancient Near East III),纽约:1995年,第1863页。
- ②⑦④⑥J.-J. 格拉斯奈尔《美索不达米亚年代记》(J.-J. Glassner, Mesopotamian Chronicles),亚特兰大:2004年,第209、238页。
- ②⑧②⑨B. 波特《形象、权力和政治:埃塞尔哈东的巴比伦政策》(B. Porter, Images, Power, and Politics, Figurative Aspects of Esarhadon's Babylonian Policy),美国哲学社会出版社:1993年,第63、45页。
- ③⑩W. 索莫菲尔德《马尔都克的上升:公元前2千纪巴比伦尼亚宗教中马尔都克的地位》(W. Sommerfeld, Der Aufstieg Marduks: Die Stellung Marduks in der babylonischen Religion des zweiten Jahrtausends v. Chr.),布丛、拜克:1982年,第186-189页。
- ③①D. J. 怀特曼《亚述和巴比伦尼亚:公元前1200-前1000年》,第456页。
- ③②⑤⑩W. 迈耶《亚述国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的巴比伦战争》,第155、155页。
- ③③B. 庞格拉茨-拉施坦《臻于至善:公元前1千纪亚述与巴比伦尼亚新年典礼的崇拜和观念实践》(B. Pongratz - Leisten, Ina Šulmi Īrub: die kulttopographische und ideologische Programmatik der aki? tu - Prozession in Babylonien und Assyrien im 1. Jahrtausend v. Chr.),《巴格达研究》(Baghdader Forschungen),第16卷,美因兹:1994年,第285页。A. 乔治,《埃桑吉拉之砖》(A. George, "The Bricks of Esagil"),《伊拉克》,第57卷,1995年,第174页。
- ③④⑤S. 戴利《马尔都克诸神像与创世神话的时期》(S. Dalley, "Statues of Marduk and the date of Enūma eliš"),《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24卷,1997年,第163-167、163页。
- ③⑥庞格拉茨-拉施坦将文献中一个符号读作“er”(),A. 乔治将其订正为“sal”(),故“ermu(华盖)被修正为“šalmu”(雕像),此修正得到学界认可。A. 乔治《埃桑吉拉之砖》,第174页;S. 戴利《马尔都克诸神像与创世神话的时期》,第163页。
- ③⑦W. 兰伯特《马尔都克研究》(W. Lambert, "Studies in Marduk"),《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第47卷,1984年,第1页。
- ③⑧④⑩A. 乔治《马尔都克和巴比伦尼普尔诸神崇拜》(A. George, "Marduk and the Cult of the Gods of Nippur at Babylon"),《东方学杂志》,1997年,第66卷,第65-66、66页。
- ③⑨D. 卡茨《重建巴比伦:将神话传统发展为一种新神学》,第123页。
- ④②G. 弗雷姆《巴比伦尼亚的统治者:从伊新第二王朝到亚述控制结束》,第20页。另见H. 塔德莫《正确释读阿卡德语dāku的历史含义》,第125页。
- ④③《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亚述语词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第3卷,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1959年,第174页。
- ④④A. K. 格雷森《亚述与巴比伦尼亚年代记》,第162页;H. 塔德莫《正确释读阿卡德语d? ku的历史含义》,第131-132页。
- ④⑦M. B. 罗顿《西亚材料和埃及第19王朝的年代学》,第253页。
- ④⑨A. 波贝尔《豪尔萨巴德亚述王表(续)》,《近东研究杂志》,第2卷,1943年,第56页。

作者简介:陈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71

(责任编辑:姜守明)